



共和国开国元勋自述丛书

邓颖超 自述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 编著
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

解放军出版社

邓颖超自述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
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

编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颖超自述/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 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编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1

(共和国开国元勋自述丛书)

ISBN 978-7-5065-6728-2

I. ①邓… II. ①中… III. ①邓颖超(1904~1992) - 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8768 号

书 名: 邓颖超自述

编 著 者: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 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

责任编辑:刘燕红

责任校对:马 涛

封面设计:李 戎

出版发行: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jchs@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16 开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15.75

印 数:1-10000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5-6728-2

定 价: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开篇自述	(1)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7)
第二章 恋爱与结婚.....	(35)
第三章 在大革命洪流中.....	(42)
第四章 坚持白区斗争.....	(49)
第五章 参加长征.....	(60)
第六章 在北平西山疗养.....	(67)
第七章 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	(84)
第八章 延安岁月	(109)
第九章 转移晋绥	(116)
第十章 参加土改	(124)
第十一章 迎接胜利	(131)
第十二章 建设年代	(135)
第十三章 “文革”岁月	(152)
第十四章 走进新时期	(161)

第十五章 晚年情怀	(173)
第十六章 忆恩来	(194)
尾声 致中共中央的信	(206)
委托下列几位同志办的几项事	(208)
附一 爱泼斯坦等访邓颖超记	(210)
附二 大事年表	(233)

开篇自述^①

1904年，我出生在中国西南部广西省南宁市，我家只有一个孩子。我父亲是一位军官，也是一位政府官员，我还不到六岁他就去世了，留下我母亲，没有什么家产。由于我们家没有近亲照料我们，我母亲不得不找点事做。她是一位受过教育、有才智的妇女，但要找点事做对她来讲是很困难的。我们迁到了天津，她在很艰难的条件下当上了教师，勉强维持生活。对我来说要得到好的教育是不可能的，但在1913年，我进了一个学校，这所学校叫平民学校，我母亲在这所学校里任教。我得到了开办这所学校的社会党的帮助。这是一个



1916年，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的邓颖超。

^① 本文选自海伦·福斯特·斯诺编著的《中国新女性》一书。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

社会主义政党，甚至那时我就在这所学校里接受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当时，袁世凯是政府首脑，这些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反对他。后来，他关闭了这所学校，逮捕了大部分教师。杀害了校长。这些社会党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受到了一些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我母亲同其他教师失业了，我也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她懂一点医药，当了护士，并且当了家庭教师。她那时送我上了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我积极地参加了学生运动，反对政府接受《二十一条》。

这时我已经长大了，能够认真考虑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了。每当我漫步街头时，我常常看到当新娘和举行婚礼的，但我下了决心：如果一位妇女要想过独立的生活，她必须能够保证有一个好的工作。

进师范学校初级班时我 13 岁，经过两年极其刻苦的学习之后，我学完了这所学校规定的 8 年的全部课程。因为我年纪很小，学习太紧张，我的身体垮了下来，染上了肺结核病。然而，我母亲知道怎样照料我，我又恢复了健康。

在这段时间里，我憎恨中国的旧习惯，比如包办婚姻和对妇女的不公平待遇，但我提不出纠正这种做法的建设性主张。我只是想，如果一个女孩要想过独立生活和获得自由，那她就必须自食其力。在学校里，我最感兴趣的课程是地理、历史、音乐、体育和汉语。我不喜欢缝纫。

我在 1919 年反对亲日派的“五四”运动中非常活跃，并领导学生同一些反动教师进行斗争。天津的学生 5 月 7 日行动起来了。我们把男学生和女学生分头组织起来，因为要让男女学生一起行动是更困难的事。我们的组织是妇女爱国联合会，我们同男学生合作，其中就有周恩来。在这群情激愤的时刻坐下来学习是不可能的，我

们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我们把一位日本老师赶走了，并撕毁了他的教材——现在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为了同日本人进行斗争，我们必须学习日语。当局把我们一些学生拘留起来，我们彼此无法联系。我们受到教师的镇压，得不到外界的支持。回顾这段时期的往事，我们当时能够继续进行斗争，现在看来是很了不起的事。然而，为了把“五四”运动坚持下去，10月10日，我们不仅把学生组织起来，而且把天津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了。当我们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集会，天津警察把好几万人的集会围困了一天一夜。我们讨论了对策，决定让女学生当先锋冲破封锁线，因为我们想，警察不敢轻易动手打我们。我们用竹竿当旗杆，以使用作棍棒。当我们正要离开时，派去散发传单的汽车回来了。周恩来坐在车里面，于是利用这辆汽车帮助我们冲破了警察的封锁线。我们对警察十分愤慨，要求他们道歉。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允许学生爱国。警察派代表同我们磋商，但我们回到学校心里仍十分气愤。第二天，我们又上街同警察斗争。在那几天里，所有的火车和交通工具都中断了。

1920年5月7日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学生们想举行一次集会，纪念国耻日，但校长进行阻挠，并且扬言谁参加集会就开除谁。不管怎样，学校的全体学生还是都去参加了集会。当我们返回学校时，所有的门都给锁上了，我们不能进去。墙上贴出了上面写着将要开除的所有学生领导人的名单。我们讨论怎么办，所有学生都聚到一块儿，决定离开学校。那些家不在天津的学生住在同学家里。这时当局才开始认真考虑如何控制学生，设法说服他们返回学校。我们不得不走出城外10里去找个地方开会。我们动员了所有同情我们的家长、报纸和其他组织支持我们，经过就这个问题进行一周的斗争之后，成功地使学校当局撤消了开除学生的命令。

这年夏季，我从师范学校毕业，结束了学生生活。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在这段时期里，男女学生都分别地组织了起来。后来在

天津思想进步的学生中，开始组织了一个大约有二十名领导人参加的组织，名叫觉悟社。我们在这个组织里谈论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虚无主义等等。我们讨论俄国革命，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却一无所知，当时陈独秀刚刚开始组建共产党。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学生有郭隆真和马骏。今天这个组织里唯一活着的人可能就是我和周恩来来了。这个时期为后来的活动打下了基础，对新思想虽然认识混乱，但至少教育我们要憎恨中国的旧制度，以及为改变这种制度要进行斗争。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

现在我的生活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之后，学校开始使用女教师。我在一位老师的帮助下，在北京的一所私立学校找到了工作，这所学校隶属于师范大学。另一个女孩子和我是在这所学校里首次任教的女教师。我们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继续提高我们自己的教育水平。我们的许多同学都到国外留学去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母亲失业了，我必须养活她。第二是结婚问题。一方面我憎恨旧式的婚姻，另一方面我也不同意所谓的自由恋爱思想。这时，男女学生们对这种问题几乎没有什么了解，要建立一种现代的婚姻是很困难的。许多悲剧发生了，男人常常不负责任地同女人离婚。我的主要问题是第一个。我没有爱上任何人。当时周恩来和我只是好朋友。我只有17岁。我在学校工作是很艰苦的，我早上7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我是这所学校的主要教师，我的任务很重。当时正为女孩子开放更多的就业机会，她们甚至在银行里也能找到工作。事实上，北京开设了一家妇女储蓄银行。突然出现了许多讲授会计和商业工作课程的学校。我想，也许我到银行里工作能挣更多的钱，也就能积蓄一点钱供自己上学，所以我夜间还到一所会计学校学习。然而，两个月后，由于这种学习加工作的紧张生活，我的身体垮了。我放弃在学校的教学工作，从一所商业学校毕了业，但未能在银行里找到工作。在北京待了两年半之后，我

回到了天津，在一所小学当教师。

这时我的朋友全都受到了更进步的思想的影响。1923年，我遇到了一位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蔡和森，不久我就结识了好几个共产党朋友。在北京，女权运动——女权运动同盟会——已经开始活动，我们在天津也同样开始了这样的活动，为争取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平等而斗争。上海、广州和其他地方都有这种运动。在1924年以前，我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1924年，天津成立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青年团，我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加入了。我们成立了宣传部，我是领导人之一。入团3个月之后，我就加入了共产党，并担任妇女书记。这时，我们正在建立国共两党联合阵线，所以我也参加了国民党。孙逸仙从广州来到华北，呼吁召开国民议会，讨论全国问题。许多组织开始声援召开这个会议。为了得到如何召开这次会议的建议，我们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由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代表参加的会议。正在开会期间，孙逸仙去世了，这对我们产生了强烈影响。我是天津的代表。这时，我的一位朋友和我正出版《妇女每日新闻》，但这项事业后来失败了。

孙逸仙去世一个半月之后，上海爆发了“五卅”劳工运动。我们在天津积极地作出了响应。我们在天津有两个组织：一个组织的宗旨是“救国”。我是地方分部主席之一，一直很活跃。天津警方很注意我，并搜查了我的文件。当国民党为其第二次代表大会挑选代表时，我被选为直隶地区党代表之一。在去广州的途中，我在上海停留了十天，我在那里会见了几位女共产党员——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和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我访问工厂，发表演讲。当局没有进行干预。

我1925年8月到达广州后，周恩来和我结婚。我担任广州共产党妇女部的书记，而且一直担任到1926年1月。作为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当廖仲恺夫人的秘书，同她以及

孙逸仙夫人合作。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我在广州一直工作到 1927 年。国共两党分裂后，6 月，我逃到了汉口，在那里待了 5 个月。生活非常困难。我做秘密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1927 年年底，我去了上海。在那里建立了党中央委员会。我负责妇女部。1928 年 5 月，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①，11 月返回中国。回国后，我一直待在上海，在党中央委员会妇女部工作，直到 1932 年上海战争爆发之后。这是小心翼翼的秘密工作。我每天出去，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捕。警方搜查了我在外国租界的房子。第十九路军中有许多共产党人，我帮助他们工作。后来他们当中有些人和许多其他共产党人一起被捕。这时，许多好朋友都被杀害了。我们的工作在上海已不可能进行了，于是我于 1932 年到了江西苏区。从事这种秘密工作以及共产党人受到的镇压使我更加忠于党，自那时起，我就坚信失败是绝对不可能的。

^① 应为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颠沛流离的童年

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娘（儿）俩的日子过得很苦，有时，实在没办法了，母亲就去变卖一些衣服家具，但即使那样，她还是婉言谢绝了我父亲一位朋友的资助。当时那位朋友想把我们母女俩接到昆明去，可是我母亲不愿过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她就带着我颠沛流离四处奔波。^①



邓颖超和母亲杨振德

^① 以上内容选自赵伟著《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 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投身学运

1919年“五四”运动时，我才16岁，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念书。今天谈起30年前的往事，由于30年不算短的时间和革命的曲折复杂经历，已经冲淡了我的许多记忆，现在仅就我能记得的谈谈：

那年5月4日，北京学生发动示威，要求“惩办卖国贼”、“拒绝《凡尔赛和约》”，学生们在激愤中发生了火烧赵家楼、怒打卖国贼的事件。次日消息传到天津，震动了天津各校的同学，纷纷议论，立即响应北京同学的爱国运动，在7日，天津学生就举行了示威，很快的（地）组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女学校同学为主的



邓颖超（左二）同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同学合影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随后又成立了“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当时我们只凭单纯的爱国热情，喊出的口号除了前面的两个以外，还有“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不做亡国奴”等等。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是采取镇压的政策，是用警察、刺刀、子弹、水龙扫射、殴打以至逮捕等各种办法压迫学生。我们在斗争中锻炼，逐渐提高了觉悟。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思潮、新文化正很快地涌入古老的中国，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开始在中国青年中起了影响，这就给了“五四”运动以新的进步因素，使之向前发展。

“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当时，在我们的思想上还没有弄明确。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的认识也才逐渐地明确起来。“五四”时，我们也不知道“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结合”，只知道列宁是苏联革命的导师，他是要为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谋解放而已，不过我们当时的确也有一种自发的直觉认识，要救国需要冲破学生的圈子，救国不能单靠学生，必须要“唤醒同胞”。所以，我们很重视宣传工作，组织了许多讲演队。我当时就担任着“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和“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长。我们的讲演队定期地经常地到各处讲演。在初期，女学生因受社会封建习俗的束缚，还不能和男学生一样地出现在街头讲演，而是限于在市内各宣讲所、民教馆，以及公共集会的场合。每次听讲的人都很多，我们讲的是要大家起来齐心救国，要达到惩办卖国贼的目的；讲述朝鲜亡国后，当亡国奴的惨痛；我们应有爱国开会的自由，抗议当时北洋政府对学生的迫害等等。我们讲的人，有时声泪俱下。听的人也很受感动。另外我们还作家庭访问，常到比较偏僻的地区和贫民区，挨家宣传。有的人家对我们很热情接待，有的人家就把大门一关、拒我们于门外。但我们碰了钉子一点不灰

心，还是挨家敲门访问。记得那年暑假期内，有一次出发去天津西头讲演，回来时赶上倾盆大雨，每个人淋得和水鸡子一样，但同学们一点也不泄气，下次还是按时照样地去干。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重视文字的宣传和报纸的作用，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出版了3日刊的《学生联合会报》，后来改为对开一大张的日报，和现在《人民日报》的篇幅一样大。每期销到20000份以上，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个报的主编人就是周恩来同志。“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出版了一个周刊。这两个报纸报道着当时国内外的时事消息和全国各地的学生爱国运动消息及反压迫的斗争，还有社论和政治性的论文及文艺作品等等。

关于“五四”运动中，学生要求民主和科学的具体事实，我只能从当时天津一个地方的情况和我所活动的一个角度上举几个例子：

由于反动的北洋政府，对外媚日，对内袒护国贼，不断地压迫学生，我们没有爱国的自由，当时我们最迫切的民主要求就是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等民主权利。我们为此遭受过多次的压迫，也作了多次的斗争。例如“五四”那年的10月10日，由“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天津全市市民大会，继续坚持惩办卖国贼，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加紧抵制日货，举行游行示威。在事前，我们已经风闻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外号叫杨梆子）准备以武装解散我们的集会，阻止我们的游行。但我们毫不恐慌害怕，我们也作（做）了应付武装警察的准备。会场的布置和队伍的排列是把市民们站在主席台的周围，然后把有组织的学生站在市民的外围，又把女学生站在最前列，准备被武装包围时先由女学生冲出重围。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拿的旗子，都是用专买来的坚固竹竿制成的，准备把竹竿作为事变发生时斗争的武器。在预定开会时间以前，市民和学生的队伍大群大群的（地）向南开广场集合起来。果然不出我们的预料，警察们大批出动，拿着上了刺刀的长枪，把我们整个

的会场包围起来了。我们仍按开会的秩序进行，直到游行示威开始时，我们就和武装警察发生了冲突，首先我们学生向前冲，一面冲一面向他们宣传呼喊：“警察也应该爱国！”、“不要打爱国学生！”，同时因为他们已经动武，用枪托殴打我们，很多同学挨了打，有的眼镜亦被打破，于是我们也就挥动手上的竹竿抵抗，并用竹竿把他们的帽子掀掉地上。当他们弯腰去拾帽子的时候，我们就乘这空隙向前冲。正在搏斗紧急的关头，来了一支外援的队伍——恰巧学联的汽车宣传队开到会场。里外夹攻就打开了一个缺口，大队跟着汽车冲了出去，于是环城示威游行，直到警察厅质问杨以德，向他提出抗议，一直坚持到第二天黎明才散。这次事件激起了女同学极大的愤慨，于是不再管封建习俗的限制，第二天就走向街头，不顾一切，到处举行街头露天讲演，控诉杨以德对于学生的迫害。

在10月10日事件以后，压迫愈来愈紧，过了一个多月，“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查封。马千里、马骏等24个领导人被逮捕。紧接着“天津学生联合会”被查封，我们不能公开活动了。于是就转入租界，在一个同学家里借了一间小屋继续办公、坚持斗争。在12月中，为了要求启封“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学生会”、释放被捕代表，发动了全天津同学的大请愿，包围省政府，要求当时的省长曹锐出来答复。但他避不见面。我们推举代表去见他，而省府大门早已紧紧关闭，大批军警护卫，不准代表进去。我们的代表——周恩来、郭隆真（女）、于方舟等4人，就从大门底下的门坎洞里钻了进去，一进去就挨了打，被逮捕了。外面的学生大队更加气愤，坚持不走，直到半夜，反动的省政府又拿出最后的手段，用刺刀、枪托、水龙来武力镇压，驱散了学生，演出了流血惨剧，很多同学挨打受伤，头破血流，重伤的送入了医院。从此我们更认识了反动政府的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利，决不是不经过斗争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的。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也就是运动的

后期，我们的工作重心转入了反对非法逮捕，营救代表，要求把拘押的代表转送法院公开审判，争取舆论的援助，一直到夏天，先后被捕的代表 28 人才全体得到释放。

我们不但在校外受反动政府当局的压迫，在校内也受校长教员的压迫，禁止我们出校活动、参加会议。例如在 1920 年的 5 月 7 日，我们女师同学为了参加“五七”国耻纪念大会，与学校当局发生了冲突，虽然终于冲出去开了大会，但回到学校时，校中已挂出牌示，竟公布将全校 200 多同学全数开除学籍。我们气极了，但是一点也不恐慌害怕，决不屈服，大家一致废寝忘食，连夜收拾行李，全体搬出学校，但学校当局反关起大门不准我们搬走，把电话室也封锁起来。全校骚动，闹了一整夜，到第二天清早，还是全体坚决搬出了学校。我们避开警察的监视，到校外种植园一带去召开会议，斗争坚持了一个星期。终于在家长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迫使学校当局收回成命，先收回了开除我们的牌示，然后我们全体同学才胜利回校。

我们当时，虽然还不知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有满腔的爱国热情，为了救国、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封建势力，有勇于牺牲一切、在所不计的革命精神。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同时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这也是“五四”的民主运动中一个主要内容，提出了“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要求“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学开女禁”、“各机关开放任用女职员”等。在天津首先是把男女同学分别组织的学生联合会合并，共同工作。这件事在起初也是遇到了阻力的，女同学中也有不赞成的，有顾虑社会舆论不同情的，有怕合并后被人说男女混杂闹笑话的，但男女同学中的进步积极分子终于冲破了这些阻碍，勇敢的（地）实行合并，并收到良好效果。当时男女同学间的相处都是极其自然坦白的，工作上互相尊重平